



巾帼英雄

陈粹芬

李以助

为推翻清王朝、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中山先生一生曾三次婚姻：一次是孙、卢联姻于香山（即中山县），乃父母作主；二次是孙、陈联姻于香港，乃自由恋爱；三次是孙、宋联姻于日本东京。卢夫人与宋夫人正史皆有记载，惟陈夫人连野史也无叙述，这不能不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憾事！

1912年，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。1913年，由于工作需要，聘请老友宋霭如的女公子宋蔼龄任秘书。翌年，中山先生亲作“红娘”，介绍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后，继聘宋蔼龄的二妹宋庆龄任秘书。孙、宋在长时间的合作共事中，彼此由志同道合，发展成为情投意合。在彼此未结为伉俪前，中山先生分别征求卢、陈两位夫人的意见后确定：孙、卢离婚，孙、陈分居。孙、宋联姻后，陈夫人单身赴南洋，定居于马来亚之庇能，因为她在反清斗争时，曾多次来到庇能，并深受庇能各界侨胞的爱戴。陈夫人隐居庇能后，抱养甫出世的一位姓苏的华侨女婴为女儿，取名孙容。母女俩在庇能的生活，除了受到当地华侨及当时的老兴中会员、同盟会员、国民党员（如萧佛成、邓泽如等人）的照顾外，也受到孙科的接济。孙科也曾亲赴庇能劝请她回国，但未能成行。

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陈夫人应孙科之请，毅然回国。当时国内处于宁粤分裂状态，孙科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（即西南政府），陈夫人在广州东山给孙科照料家务，养女孙容就读于广州河南真光女子中学。

1991年10月10日，广东省各界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80周年，港澳、海外50余位代表应邀参加纪念会。

会后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祁烽先生率领代表们乘车前往中山县翠亨村，瞻仰中山先生故居。我和内子丘文昇等一行十余人，拜谒了中华民国缔造者、推翻清王朝的元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陈粹芬夫人墓。站在这位“与其无义而有名兮，宁穷处而守高”的巾帼英雄墓前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。当年我受教于她的一切，无不呈现在眼前。

光辉的一生

陈粹芬夫人（流亡日本时，取名香菱），原籍厦门同安，1873年出生于香港新界之屯门，排行第四，人称四姑娘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，被尊称为陈四姑。陈四姑从1891年至1913年，一直追随襄助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斗争。在反清革命过程中，她积极参与起义行动，如私运军火于广州，任交通通讯于日本，随军进攻于镇南关，宣传反清檄文及三民主义于马来亚之庇能及新加坡。22年如一日，历尽艰辛，

1936年发生“六·一”事件(即两广事变),陈济棠、李宗仁反对南京政府,不久被南京政府平定,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战胜者之心情来到了广州,并接受居正(当时任司法院长)的意见,亲书慰问陈夫人,还送上10万元作为她的建房和养老之用。但房屋没有建成,就爆发了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。此时,孙容已赴美留学,陈夫人不顾年事已高,奋勇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,积极宣传我必胜、敌必亡的道理。为表示抗战必胜、建国必成的坚定信念,她的五个外孙,均由她取名为必胜、必兴、必达、必成、必立。她的这种“寸心至死如丹”的爱国主义精神,令人肃然起敬。

1941年,她随女儿孙容、女婿孙乾一家人居住广东韶关。抗战胜利后,回到故乡中山县石岐居住。

抗战胜利不到一年,内战发生。陈夫人于1949年随女儿一家赴香港,住九龙界限街。女婿孙乾脱离军界,经营格兰饭店于尖沙咀。孙乾和孙容的五个儿子均留学美国,分别取得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,对外婆颇具孝心。1957年春,孙容因患癌症病逝,陈夫人因忧伤过度,导致行动艰难,靠轮椅代步。1960年,这位英勇、慈祥、俭朴的巾帼英雄与世长辞,终年87岁。陈夫人的治丧仪式颇为简单,不登报,不发讣告,匆匆购地安葬于荃湾华人墓地。

1986年,北京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20周年的隆重大会,孙科的女公子孙穗华、孙穗英、孙穗芳,孙乾的几位公子均回国参加。会后不久,孙乾由美回港,将岳母的遗骨移至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,面向大海安葬,以示她素具大海般之胸怀。妻子孙容的遗骨亦同时迁葬于此。

难忘的晋见

我是1942年7月21日晋见陈夫人的。能够有幸见到她,得力于她的女儿孙容和女婿孙乾。

孙乾是我在陆大时的兵器学教官,出生于美国加州,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工科二十二期和意大利军事学院。根据当时规定,凡在外

国高等军事院校毕业者,必须在本国陆军大学任教两年,因此我有幸受教于他。孙乾老师除在陆大任教外,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部参谋、余汉谋的第七战区通信团团长、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副师长。1947年脱离军队,1948年宋子文主粤,任他为中山县县长。孙乾老师现在美国,与次子同住于三藩市(即旧金山)。

孙容是我的英语老师,她就读美国夏威夷大学前,就与孙乾热恋,海誓山盟。他们两人在孙家是属姑侄关系,孙乾是中山先生的兄长孙眉的孙子,长辈们尤其是卢夫人反对他们成亲。由于两人毫无血缘关系,后来由孙科出面玉成其婚事。他电告孙容前往意大利同正在此留学的孙乾结婚,并请驻意大使刘文岛主持婚礼。婚后,孙容改名为苏仲英,两人更加恩爱。不幸的是孙容在44岁时,与世长辞。

我的这两位老师,一文一武,各有专长,他们严于律己,宽厚待人,使我终生难忘。

1942年,我在陆大特五期毕业时,打电报给孙老师,希望利用毕业赴部队报到的空隙,到韶关晋见陈老太太。孙老师立即回电,表示热烈欢迎。我于7月17日出发,21日抵达韶关,次日便见到陈夫人,她知道我是她女儿和女婿的学生,将我当作自己的晚辈对待,使我毫无拘板之感。当时她已69周岁,面目清秀,头发乌黑,两眼炯炯有神,思维敏捷,行动轻快,不像年近古稀的老人。在我们一整天的交谈中,她谈笑风生,毫无倦意。

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交谈中,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向陈夫人请教。她根据我的提问尽其所知,一一作了回答。

问:我在1933年随父到香港时,曾亲至屯门红楼参观您的故居,但是对您和中山先生当时在红楼的情况缺乏了解,可否谈谈?

答:你已去过红楼了,红楼是以红砖砌成而得名。它靠近海边,当年革命青年来红楼会见孙中山时,多是在夜间乘小船来的。陈少白、尤烈、陆皓东、冯自由、郑士良等人曾多次来此。那时,我服务于屯门基督教堂(美国纲纪慎会),

经陈少白介绍认识了孙中山。他初次见我，就叙述其壮志，决心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，决心效法洪秀全、石达开，“相率中原豪杰，还我河山”。当时，“孙中山是一位领袖人物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来，经过不断交往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在我19岁时，彼此便成为革命的伴侣。这一年中山已26岁，他就读于西医书院还差一年毕业。孙科就是在这年出生的。

问：我少年时代在广州读书，曾听老师讲过中山先生反清起义在广州失败的故事，但对详细经过以及您和先生是怎样脱险的，很想得到您的介绍。

答：1895年广州起义前，中山行医于澳门和广州。由于他对内科、外科、妇科造诣较深，医术高明，他的诊所颇有名气，闻名遐迩。中山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，诊所对患者实行义诊，受到群众的欢迎，并广为传颂。中山在两年行医中，还与红楼诸友完成了改良中国政治与经济计划（主要内容为“四尽”，即人尽其才，地尽其利，物尽其用，货畅其流），要求政府采纳实施。中山与陆皓东带着计划去会见两广总督李瀚章，李瀚章要他俩赴天津面呈北洋大臣李鸿章（因此此计划世人称为“上李鸿章书”）。他俩到达天津呈上计划后，腐败的清廷根本不予重视。他们回到广州后，中山决定师法洪秀全，采取武装革命。随即将设在檀香山的兴中会总部移设香港，准备武装起义。在筹购武器弹药方面，中山认为陆皓东年轻，有胆有识，由他来主持其事。陆皓东确实能干，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运回武器好几批。不幸的是，在最后那次转运武器中，在广州长堤附近被巡防营的缉私队缉获被捕，武器全部被没收。当时由我经手分藏各处的武器，如短枪、短刀、子弹、炸药、手榴弹等，均安全无事。

由于人们都知道我是中山的夫人，又是他的护士和卫士，所以在得悉陆皓东被捕后，我即不敢回诊所（药局），也不敢回家，只好浪迹亲友家静听消息。11月下旬，接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派人秘密通知，陆皓东被斩首。随后又接

三合会另一首领深夜通知，说缉拿中山的文告已发出。于是，中山和我在悲痛默祷陆皓东中，匆匆收拾行装深夜逃走。同时派专人至家乡（香山县），让卢夫人带着阿科（孙科）迅速赴澳门避难。两天后，全家会于澳门，凄然相对。数日后得悉，如果我们当晚迟走几小时，就会被捉拿归案了。这不能不是天佑中华啊！广州起义，原计划集中三合会百余人相机伏击两广总督李瀚章，不幸失败。这一失败，导致清政府对中山的不断追捕，直到它覆灭前从未中止过。也就是说，此后的15年中，中山都是过着流亡生活，生活非常艰苦，我是他的革命伴侣，当然也不例外。

问：1900年的惠州起义，是中山先生领导反清斗争的较大一次。当时他在日本、台湾策划遥控，而实际执行的是香港兴中会。在起义前，您在日本横滨立过鲜为人知的功劳，能否将此情况讲讲？

答：我们在流亡后，住在横滨时间较长，我没有什么功劳，但有点苦劳。当时，所有追随中山的革命党人来此，他们的吃饭、穿洗都是由我承担，我实际上好似一个保姆。另外，中山将兴中会分会设在横滨，日本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宫崎寅雄、头山满、西园寺、犬养毅等等都与中山常来常往，一切接待工作都由我操持。

1900年由于清廷丧权辱国，广东人心惶惶，中山在日本曾策划广东独立、推翻清廷的运动。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士良，愿在中山的领导下举行惠州起义。当时三合会在惠州地区非常活跃，但武器很差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香港兴中会通过海员工会从美国、加拿大等国购买武器。所有运输武器的邮船经过横滨，都是由我亲自联络与接洽，然后利用香港深圳河通过宝安县转运至惠州地区。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，当然是非常吃力的。但为了推翻清廷，深感苦中有乐。

问：中山先生领导反清革命，由于环境之所限，他在遥控指挥下举行多次起义，屡遭失败，但在广西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之役，中山先

生和您亲自上阵督战,取得攻克该关的胜利。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。

答:攻打镇南关是我初次上战场,中山也是初次上战场。他沉着应战,指挥若定,这对官兵的勇猛攻击敌人,影响很大。

这次起义,得力于香港同盟会事先策动黄明堂率部起义。他们在关内虚张声势,使守关清兵疲于奔命,战斗力锐减。另外,中山在决定攻打镇南关前,两次赴安南同法军、安南军中的革命青年协商,组成不足一百人的革命军,并从他们那里借来山炮。战斗打响后,革命军在炮兵的协同作战下,很快占领了镇南关,俘虏清兵数十名。中山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,不许杀害,下令释放。他亲自对俘虏们说:“今后不可与革命军作对,革命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,是专门同腐败的清朝作对的,你们回去要反对他们。”

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六天,清军反复增兵反攻,均被击退。第六天增兵至千余人,中山下令撤退至安南境内。这一战,起义军声威大振,参加起义军的很多人,是追随中山的爱国华侨以及粤桂青年学生。我随军是担任“伙头军”,为部队煮饭送饭而忙碌,确实很辛苦,但为了反清救国,什么艰难困苦也能忍受。

问:最后,我有个口欲言而嗫嚅的问题,而这个问题世人都十分关注。因此,我不揣冒昧地提出:您是中山先生的伴侣,为推翻清朝,历尽千辛万苦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在推翻清朝后,中山先生当了民国总统,您竟离开他而独居,世人认为他有负于您,这一看法对吗?

答:我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,父亲虽是个郎中(医生),但难以维持家中数口人的生活,那时只是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,命该如此。自从认识中山以后,他给我讲了很多的道理,我才认识到我们的贫困是腐败的清政府造成的,因此立志跟随他革命,推翻清朝。后来,中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,打倒了清王朝,建立了民国,这就是说,我参加革命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。我非常明白,中山当了总统,他面临的建国重

担是非常艰巨的,甚至不亚于推翻清朝,因此,在他身边必须有位有知识有才能的贤内助来辅佐,以减轻他的负担。基于这一考虑,我自愿离开他,并不是他抛弃我。我自离开他以后直至今天,义无反顾,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,对中山对我是有利的,国家对民族是有利的。既投身革命,是不可有私心妄念的。

中山一生,博爱为怀,一无所私,二无所畏,他壮志未酬而早逝,实为国人之大不幸。他在北京患病时,我心上思念,坐卧不宁,时刻祝愿他转危为安;他辞世后,我设坛遥祭七天七夜,祈祷他安息于九泉。

我今年已是70岁的老人了,“回忆”总是与我相伴,它给我以很大的快乐。当年我在红楼跟随中山进行反清斗争,迄今已过几十年。几十年来,世异时移,几度沧桑。当年我在海外接待过、帮助过、联系过的革命党人及青年,如胡汉民、汪兆铭、廖仲恺、何香凝、许崇智、陈炯明、居正、蒋介石、陈其美、邵元冲、黄兴、蔡锷、李烈钧、戴传贤、王法勤、邹鲁、谢持、林森、刘维炽、萧佛成、邓泽如、熊克武、邓铿、魏邦平、张民达等等,他们在反清、反北洋以及东征、北伐中,功不可没,真正忠诚于中山的事业。但是,在以后的岁月中,也有人悖于中山的遗愿,甚至当了汉奸,怎不令人痛心啊!

……

幸会难逢,流光易逝。同陈夫人一整天的交谈,大有弹指一挥间之感。当时的韶关,地处前线,日寇的飞机无时不来骚扰,唯独这天没有空袭警报。老人家风趣地说:“这是托你的好运啊!”翌日(1942年7月23日),我向老人家辞行,回到寓所时,曲江县县长陈任之(军校高教班二期同学)等候为我送行。他说:“你现在已是陆大毕业,又晋升为新二十师的少将副师长,昨天又能在日寇飞机“关照”下安静地同陈女士交谈一整天,真可谓三喜临门,实至名归啊!我衷心祝愿你时通运泰,大展鸿图!”同陈学长话别后,我立即奔赴湘北抗日前线。